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

戴建业自选集

戴建业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

——  
戴建业自选集

戴建业 著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戴建业 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5427-0

I. ①文… II. ①戴…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文献学—文集  
IV. ①I206-53 ②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707 号

###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

——戴建业自选集

© 戴建业 著

作 者: 戴建业

责任编辑: 陈良军

责任校对: 易 雯

封面设计: 新视点 封面制作: 胡 灿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 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308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75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3.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 自序

由于文学院要出一套“教授文库”，我将先后发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读书》、《图书情报知识》、《中国韵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和我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文章汇拢在一起，那些已经收入专著中的文章基本不选，那些文化随笔、社会评论和翻译文章一概不选，只选那些至今看上去还不太丢人的“学术论文”，其中最长的一篇达四万多字，最短的文章也有八九千字。感谢我所在的文学院和我校出版社，让这些专著以外的单篇文章有了“大团圆”的机会。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本选集中二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文献考辨和文学阐释。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我读书、教书和写书，基本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打转。

### 一

我曾在《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后记中说：“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方向虽是唐宋文学，导师曹慕樊先生在入学伊始最先给我们开的课却是文献学（又称目录学或校雠学），当时是用他自编的油印教材，即后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纲要》。从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讲到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提要》，从版本、校勘讲到辨伪与辑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听之昏昏。那时既觉得它毫无用处，又对它毫无兴趣，尽管先生讲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无多。后来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文献学，这种学术渊源决定了他对文献学的重视；也是后来才懂得，文献学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先生一开始就给我们讲文献学，是要将我们领进学术的大门，而且是要让我们‘入门须正’，可惜我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自己从事教学工作以后，才更深地体会到文献学的重要性，研究古代文学如果没有扎实的文献根基，阐释可能就会“凌空蹈虚”，议论可能就是“自言自语”。不过，我写文献学论文是自己招博士生以后的事情，当时准备要给博士生开文献学课程。原先我打算像曹老师那样写成概论性的教案，阅读了大量文献学典籍后，我发现我国古典文献学著作，其实是一种别具一格的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

学术史，也就是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无论是国家馆藏目录或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或专科目录，其实又都是一种独特的知识论著作，它们都在图书分类中凸显了知识分类和学术分类，这就是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因此，我试图将古代的文献学与古人的学术路数结合起来，并从古代典籍的分类来探讨古代知识系统的建构。这些文章发表后，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获得学界专家和朋友们的好评。《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寄给北京的《读书》后，很快就收到杂志主编的录用通知，主编在电邮中对拙文赞赏有加，这篇文章也许是《读书》上发表的最长文章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素未谋面的葛云波先生，读到拙文后特地给我来信说：“今见先生妙文，发微梁、钱、张之殊途，张皇舜徽先生之学术地位，鼓吹传统治学方法，皆中肯之言，发人深省。先生高识，吾辈服膺，故略草数言以致敬意。”我校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兄，还因此文主持过一次张舜徽先生学术个性的讨论会。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孙文宪老师，也因此文在他们文艺理论教研室开过小组讨论会，孙老师不同意我文中的观点，我到场进行了交流和答辩。正是这些热情的鼓励，正是这些善意的批评，给了我客串文献学的勇气，我陆陆续续地写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二十略》、《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面的文章，并与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的教授共同申请到了教育部一个重点课题，除共同完成课题的专著外，我自己也将写一本文献学专著。本选集中已经发表的部分论文，是我学习文献学的一得之见，未发表的版本考证文章这次没有收入选集。

## 二

我读研究生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赶上了中国学术界的“方法热”。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铺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新流派还没有混到眼熟，另一个新流派就挤到前排；一种新方法还没有学会，另一种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学者们在这些新学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论文几乎就是新概念的堆砌和轰炸。我和很多青年学者一样早先也是新方法的“赶潮人”，很快便发现一味“穷力追新”容易让人心浮气躁。思想敏锐却失之空泛，观点新颖但疏于论证，是那时大多数论著论文的共同特点。我读本科时去旁听过刘纪纲先生讲美学，很快又读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现在的研究生很难想象八九十年代李泽厚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很难想象青年学子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套用梁武帝的话来说，几乎是“三日

不读李泽厚便觉口臭”。由于李泽厚称自己的学术是从康德入手的，我又糊里糊涂地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来读，读不懂便找我校老校长韦卓民先生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学习，老实说我至今对康德的理解仍未达到“一知半解”的水平。接下来便读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美学》，这时候我才明白必须向哲学专业的朋友请教。行家告诉我说，要想读懂黑格尔《美学》，先得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要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最好的钥匙便是他的《小逻辑》。起初读《小逻辑》像读天书，朋友又推荐我读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前者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综论，后者是对《小逻辑》一节一节的注释和阐释，这两本书真帮了我的大忙。读完了这几本后再读黑格尔的《美学》就明白多了。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清通畅达，很多段落译得雅洁可诵，这使我尝到了读理论书的甜头，而且我很快发现李泽厚《美的历程》与黑格尔的《美学》一脉相承，如李氏评宋元小品画与黑格尔评荷兰小品画在思路上毫无二致。那时候对理论有极高的兴趣，收入选集中的《论庄子“逍遥游”的心灵历程及其归宿》一文，就有较浓的理论思辨色彩，我在文章中试图阐述“逍遥游”的本质特征，并辩驳将“逍遥游”比附成审美的流行观点。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才让我明白什么叫“论证”。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在职攻读张三夕兄博士学位期间，因要参加小组讨论，曾找我借阅过这本著作，她发现这本书被我画得密密麻麻，到处批写得星星点点。不仅原著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而且我翻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参考资料。相比于海德格尔对“此在”肌理分理的严谨论析，很多著名思想家的论著论文只能算一些“思想火花”。我被这位德国哲人的推理能力所折服，尽其所能学习海氏的论证技巧，尽其所能师其意而不师其词，但我学到的可能连皮毛都算不上，如《存在与时间》论述此在的沉沦与澄明，我的拙著也以《澄明之境》名其书，足见仅猎得其词句而未得其精髓，拙著中各章的论证仍然十分粗糙。

读大学时喜欢背诵贾谊《过秦论》和韩愈《原毁》一类文章，读研究生时看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才幡然醒悟，《过秦论》这种文章不过是以辞赋作论文，徒有排比波澜和雄词壮彩，“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章太炎《论式》）。晚周以后最善持论的作家首推王弼、嵇康，而嵇文尤能“体物研几，衡铢剖粒”（钱钟书《管锥编》）。《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便是自己学习魏晋文的一点心得体会。

我最感兴趣的是六朝文学，最喜欢读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因此，选集中分析六朝诗人诗作的论文比例较大。研究老子的专著，阐释庄子的论文，都是我为了研究六朝文学做准备工作时的副产品。我一直想通过古典诗歌的论

析，探究我国诗人情感体验的方式和生命境界的特征。十几年前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后记中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作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这一看法我至今还没有多大变化。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等我完成了一个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语言批评”后，我还会回来阐述中国古代诗人的情感体验与生命境界。

选集中还收录了二三篇研究现当代学者和诗人的文章。研究闻一多是由于当时我们教研室承担了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我分写这位现代学者和诗人，我想写出闻先生的学术个性。写余光中先生是因为当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更因为我对余先生的诗歌和翻译都很喜欢，我自己过去也写点新诗和旧体诗，也弄点英国小品文和小说翻译，写诗固然需要天才灵气，翻译同样非常艰难，可能是我对余先生有较深的体认与理解，听说余先生对拙文评价很好。有一篇论述杨义先生“诸子还原系列”学术理路的文章，是杨先生邀请我赴京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写于20世纪末，当时正值“世纪反思”热的时候，我那时想对20世纪后半期大陆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进行一次梳理，反思这些批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是非得失。记得当时列出的范畴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阶级性”等，我想一个个梳理，写成一本小册子。论“人民性”这篇文章投了几个杂志，所有编辑都给我泼冷水，说现在反思这种东西有点敏感，冷水把我的热情也浇凉了。我一直认为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到现在还有许多学者习惯性地套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范畴，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这种简单贴标签的“学术研究”方法贻害无穷。李白何曾知道什么“浪漫主义”，又何曾用“浪漫主义手法”写诗？为什么要给杜甫诗歌戴上“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拿西方的理论准绳来套中国古代诗人，其结果必然是削足以适应履，杀头以便冠。如果追溯一下那些舶来范畴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提法何等可笑！假如当时能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假如能得到刊物和学界的鼓励，我肯定写出了反思理论范畴的系列论文。

最后两篇论文分析文化认同、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一篇发表于十几年



以前，一篇为澳门大学2009年“‘冲突对话与文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发  
言论文(后发表于《华中人文论丛》2010年第2期)。可能是看到我这个教古  
代文学的人批判传统文化，《否定与新生——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论略》曾招  
致指责，《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大会宣读后，引起与会者和听众的热烈反  
响。这两篇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论点：仅从传统文化中“开”不  
出现代文明，文化上的抱残守缺绝无出路，躺在祖辈留下的老屋中吃喝屙睡更  
无前途，我们应有大格局和大胸襟来汲取和容纳各种异质文化，让中西文化  
实现多元互补，在祖辈留下的地基上重建民族新的文化价值大厦，用人类的  
文化精华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回首这几十年的求学历程，自己不过是受风气影响和兴趣驱使读了点中  
外书籍，在比较熟悉的几个点上写了些论学文章，既无可夸耀，也无须  
遮掩。

### 三

虽然喜欢伏案读书，喜欢在电脑上敲字，也喜欢在课堂上授课，但敲出  
来的这些论著论文，到底有多大的社会意义我一直深表怀疑。我们这个苦难  
的民族，大家都在忙着为自己的衣食操劳，哪有工夫为自己的灵魂操心？今  
天神州大地上那些翻云覆雨的强人，谁还想去弄明白“道可道，非常道”？谁  
还有心思去体验存在的澄明？有多少人在翻阅我们这些乏味的学术论文？有  
多少人愿意掏钱购买这些枯燥的学术著作？即使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乾嘉  
学者，他们那些艰深的煌煌大著今天到底又有多少读者？此时此刻有多少  
人在看《皇清经解》及其续编？我现在能够体认古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  
能够理解鲁迅先生教儿子“别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

如果上帝允许我这一生从头再来，我一定会去选择一个实用专业，为社  
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读高中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后来却阴差阳错选择  
了文学。我觉得一个男人选哪个专业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和选哪个女孩做  
自己的太太一样，都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茫茫人海中为什么要与这个  
女孩共度一生？三百六十行中为什么要选这个行当作为终生职业？当我们还  
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时，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当知道应找什么样的女  
孩时，又不太可能再去结婚了——有勇气去追求“人生第二春”的人毕竟是少  
数，大多数人都是从慢慢适应到逐渐习惯。同样，中国人向来认为“三十不  
学艺”，开辟“事业第二战场”的勇士终归不多。

这倒不是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相反，我觉得自己从事的专业对人的生活  
非常重要，只是在我们这里此类专业问津者既少，从事者的境况又不太妙。  
从识字的时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在唱赞歌，所读到的论

文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作辩护。我们学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之后，他又到我们文学院给老师大讲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明朝张溥感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谎，一定会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个学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是一种集体性的沉沦——如果这些读书人还算是知识分子的话。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其实，我们一直还跪着》的杂文，是的，在人格上和精神上“我们一直还跪着”。今天的教授和专家成了人们轻蔑嘲讽的对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沉痛地说：“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教书先生们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

我不知道这是大家在自甘堕落，还是环境在逼良为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大学这种不断折腾的管理方式很难让人静下心来，去细细地品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去从容地写自己深思熟虑的文章。学者要不断地报课题，不断地发文章，不断地出专著，不断地争奖项，不断地招研究生……学校要不断地报硕士点，不断地报博士点，不断地报一级学科，不断地报重点一级学科，还要组建什么团队，要搭建什么平台，要建什么中心，要争什么基地，不能让“一个人单打独斗”，要让“大家抱成一团”……如果没有课题，没有项目，没有经费，没有奖项，你就没有职称，没有钞票，没有地位，甚至没有老婆……二十多年前在读专业书籍和写专业文章之外，我还喜欢读点英国小品，遇上特别喜欢的文章就把它译成中文，我译的小品文在《散文》等杂志发表后，有的还被几家出版社收在《世界散文精选》中，被上海《中外书摘》转载，有时候还写点旧体诗和新诗，现在多年没有翻译英国小品和写诗了，没有阅读小品的悠闲与恬淡，没有写诗的冲动和心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诗意”。

今年暑假实在憋得慌，我在家连续写了两三个月社会评论和文化随笔，平均每天写一篇几千字的杂文，最敏捷的一天写了一万多字，从早上的六点多写到晚上两点多，有两次我写着写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阐述自己的真实思想，真有一种“兴酣笔落摇五岳”的快意，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有些文章被日本、美国翻译转载，《行己有耻与社会自净——小议日本首相菅直人辞职》，先是被日本译为日文后发布在日本雅

虎头版，接着又出现了一个中日文对照的译本刊于日本报纸，仅雅虎上日本人对拙文的评论就有十几万字之多。我的很多杂文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可见，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虽然多了点凌厉峻急，少了点安详温润，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这些杂文值得一读，至少比那些言不及义的文章好得多，如《怎样使自己学习上瘾？》、《人生难道是一场赛跑？》、《权力脸上的脂粉》、《谈微博》、《再谈微博》、《何必给苦涩的现实裹一层糖衣？》、《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故乡无此好湖山》、《假如有人欺骗了我》、《奇妙的文化逻辑》、《瞧，这世道！》（之一至之十七）等一百多篇文章，有些被国内外报刊杂志转载和连载。和那些清高的学者不同，我很看重这些文章。港澳和武汉几所大学的朋友，都说读了我的文章后十分痛快，感谢一些朋友的善意提醒，也感谢另一些朋友的激励与肯定。港澳热心的兄长最近在帮我张罗，正准备将这些文章在港澳结集出版。

#### 四

在自己读书教书的几十年里，我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教诲和帮助。我忘不了导师曹慕樊先生，他老人家年过七十还在啃抽象晦涩的现象学著作，还说“一是想把西方的现代修辞学引进唐宋诗词研究中来，一是想把西方现象学引进研究中来”（《杜诗杂说续编·自序》，三联书店）。先生的学问并不囿于集部，于儒、释、道都有极深的造诣，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所有著述都是在他七八十岁高龄时完成的。他在《庄子新义·自序》中说：“茶余客散，平人所谓无聊。藉此一书，亦复可以送老。”（《庄子新义·自序》，重庆出版社）谁读了这样的文字能不心酸？记得毕业时他送我一套四部备要本《后汉书》、《三国志》，在书的扉页上附言说：“陈寿、范晔书，皆文史高文典册，建业熟读勤求之，涵泳数年，必有所得无疑。”并反复告诫我说：“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读毕，才能开口说话。”这些书我至今大都没有好好通读，但早已张口胡说，游谈无根，真是愧对先师。

忘不了我所在教研室师长对我的指导，尤其感谢丁成泉、李广柏老师对我的关心，感谢教研室兄长和青年同事对我工作的热情支持。

感谢邢福义老师长期对我的指点与鼓励。感念已经逝世的黄曼君、孙子威老师，他们在校内外为我“逢人说项”，我研究生刚毕业时黄老师向校外刊物推荐我的论文，孙老师为我翻译的理论文章到处联系杂志。

校外有些朋友看了我的社会评论后，以为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事实与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虽然有时给学校领导提意见，但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打击报复。去年元月全校教师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教师代表当着几百名代表和全校领导的面，激烈直率地批评了学校领导的工作，这大概是我校近六

十多年破天荒的第一次，我的发言多次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事后就有人断言我的日子不会好过。没想到，同年五月经过网上投票，我被全校研究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第一名，同年七月学校同仁和领导还把我这样的落后分子评为全校教师标兵。在此，我想给学校领导说句“好话”：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性的痼疾，比起兄弟院校我们学校即便说不上更好，但也不至于比它们更糟。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在自己供职的学校和文学院感到温暖，这里有我多年的真挚朋友，忘不了他们给我和家人的无私帮助。

在学术上还得向有些师友谨致谢忱。记得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刚刚毕业我就给北京《文艺研究》寄去了一篇文章，没有想到方宁兄给我回信说这篇文章写得有分量，但文章涉及的内容不宜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信上的钢笔字工整漂亮，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位老先生，虽然没有发表拙文，但给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励，并建议我改投它刊。如今，这样的编辑比清官还难找。拙著《澄明之境》出版不久，方宁兄主动向我约稿，为拙著发表了几千字的书评。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文章尚且很难，发表书评就更不容易，有些名家想在上面发书评都被拒绝。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欠方宁兄的人情，今天要在这里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先生，这不只是在他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长文，赵先生的为人为文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他每次寄赠大作都使我获益良多。感谢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常务副主编周黎明教授和编辑李明杰博士，我和周教授只有一面之交，但每次与她电话或电邮交流，都能让我感受到她的热情与敬业，近几年我的文献学文章大多在她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每年一篇，有时每年二篇，每篇文章都是二万多字。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长期执全国同类专业牛耳，许多专业人士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也很不容易，谢谢她给予我许多宝贵的版面。尤其要感谢范军兄，他过去编辑和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十几年里，我每年在该学报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很长时间我的文章主要都是在他那里发表，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他都给我许多真诚的帮助。

感谢本书责编陈良军先生，他认真细致的编校使拙著避免了许多错误。

感谢我教过的历届学生，他们的掌声给了我自信和快乐，他们的质疑更促使我反省与思考。

感谢我的太太，感谢我的弟弟，感谢我的儿子！

感谢生活！

好了，就这些。

戴建业

2011年12月

华中师范大学南门剑桥名邸

# 目 录

自序	(1)
----	-----

## 文献考辨

###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

——论《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意义	(1)
-------------------	-----

论郑樵文献学的知识论取向	(12)
--------------	------

###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论郑樵文献学的“类例”理论	(29)
-----------------	------

### 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

——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	(45)
-------------------------	------

### 辨体·辨义·辨人·辨伪

——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下)	(61)
-------------------------	------

### 别忘了祖传秘方

——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	(77)
------------------------	------

## 文学阐释

论庄子“逍遥游”的心灵历程及其归宿	(87)
-------------------	------

### 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

——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	(98)
---------------	------

### 入世·愤世·超世

——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	(108)
-----------------------	-------

### 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

——论左思的创作	(123)
----------	-------

### 洒落与忧勤

——论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及其文化底蕴	(133)
-------------------	-------

论元嘉七言古诗的诗史意义	
——兼论七古艺术形式的演进·····	(170)
“忧愤”与“激荡”	
——元嘉士庶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的情感基调·····	(184)
生命的激扬与民族的活力	
——论李白的意义·····	(192)
痛苦焦灼的灵魂	
——论孟郊的精神生活·····	(204)
理性与激情的交融	
——论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222)
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	
——余光中对中国现代诗的理论构想·····	(232)
论“诸子还原系列”的学理意义·····	(240)
“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	
——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	(254)
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比较分析·····	(265)
否定与新生	
——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论略·····	(278)
戴建业主要著述简目·····	(285)

#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

## ——论《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意义

《汉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志目录”，由于它是就《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sup>[1]</sup>，因而它也是一部最早的“国家馆藏图书目录”，它的分类法深刻影响了二千多年来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后来的四部分类法与它可谓“嫡脉相传”<sup>[2]</sup>，同时它还是我国最早最全面的一部“学术史”，它第一次对当时所有的学术和知识进行了分科和分类。图书分类以学术知识分类为必要条件，没有学术知识分类就不可能有图书分类，因而要充分认识《汉志》在目录学上的价值，首先就必须明了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它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sup>[3]</sup>，而它“学术之宗”的地位、“明道之要”的原因以及学术史的意义，主要又体现在三个层面：总百家之绪，溯学术之源，明簿录之体。

### 一

要综论百家之学自然离不开学术分类，最先给学术分类的大概是孔子，《论语·先进》记载他将弟子学业的专长明确分为四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sup>[4]</sup>这就是后世所谓“孔门四科”。当然这里的“德行”和“政事”还很难隶属于学术。第一次阐述天下学术的是《庄子·天下篇》，该文将“百家之学”分为七派：(一)邹鲁之士和搢绅先生；(二)墨翟、禽滑釐及“苦获、己齿、邓陵子”；(三)宋钘、尹文；(四)彭蒙、田骈、慎到；(五)关尹、老聃；(六)庄周；(七)惠施、桓团、公孙龙<sup>[5]</sup>。庄子显然是将学术思想倾向相同的思想家或学者归为一类。稍后的荀子时而将百家学术分为：(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籀；(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六派<sup>[6]</sup>，时而将当时学术分为：(一)墨子；(二)宋子；(三)慎子；(四)申子；(五)惠子；(六)庄子等六派。荀子<sup>[7]</sup>和庄子的分类方法都是把学术思想倾向相近的人归为一派。分为七派的庄子也好，分为六派的荀子也罢，庄、荀等先秦学者都未曾对各派进行命名(除儒家一派以外)，只是将倾向相近者归为一类，以其中代表人物为标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

代，不同学派之间固然常常相互讨伐以突显自身的存在，相同学派之内也往往彼此争论以控制该学派的“话语权”；针锋相对的学派之间可能相互渗透，同一学派之内也许水火不容；恶语相加的学者实际上可能属于同一学派，相安无事的学者也可能分属不同阵营。这样，给各个学人进行归类相当困难，给各个学派进行命名更为不易。以人归类要么因各人分类的标准不同，要么因各人见仁见智，有时把差异很大的人硬拉在一起，有时又把同一学派的人分为两家，不仅容易造成人言人殊，而且同一个人也难得前后一致，如《庄子·天下》中把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非十二子》中荀子更将孟子和自己分为两家，又如《荀子·非十二子》中墨翟、宋钲隶属一家，而《荀子·解蔽》中墨子与宋子又分成两派，可见他们二人的分类多少有点随意。要给每一个学派命名就得深刻把握每一个学派的本质特点，分清各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还得具有巨大的抽象能力和归纳能力，要给一个学人归类就得了解一个学人的学术宗旨、学术取向、学术渊源及学术演变。没有博洽多闻的学识，没有融贯百家的识力，就断然不可能给学人分类和给学派命名。要准确给学人分类，就必须给学派命名，否则学人就无类可归。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第一次给学派命名，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术分别命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并阐述六家的要旨，品评各家的得失<sup>[8]</sup>。不过司马谈并没有囊括先秦以来所有的学术，只是论述了刘歆《七略》中《诸子略》的一部分，而且仅给诸子六家命名，并没有给分属各家的学人及其著作归类。

综论百家之学，部次天下之书，这一伟业是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几代人共同完成的。班固在《汉书》中多次高度评价了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学术史地位：“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sup>[9]</sup>，最后两句肯定了刘向在总结学术和部次图书上开创性的意义。汉成帝时期刘歆“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哀帝即位初期“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班固还认为“《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sup>[10]</sup>。他自己则在刘氏父子的基础上“爰著目录，略述洪烈，述《艺文志》”<sup>[11]</sup>。郑樵全不顾班固这种史家的诚实，反而认为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纪、志、传则追司马之踪，《艺文》则躐刘氏之迹”<sup>[12]</sup>。班固家世硕儒学有根底，《后汉书》本传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究”<sup>[13]</sup>。《汉志》虽原本《七略》，但甄审、著录和叙次的义例并不尽同于前者。当代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说：“观其甄审群书，严于别择去取，盖视刘氏尤有进焉。”<sup>[14]</sup>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交待自己编《艺文志》和撰《汉书》的宗旨时说：“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



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sup>[15]</sup>由此可见班固抱负之宏伟。

可以说《汉志》是刘氏父子和班固的共同成果。《七略》“总百家之绪”，《汉志》也是“总百氏”之学，是对“九流百家之言”的一次全面学术总结。它不只是给诸子六家命名，而且是给“学林”、“百氏”之学命名；也不只是给百家之学命名，而且还建构了古代知识的构架，整理了当时知识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给“群书”分类，基本确立了我国古代二千年来图书分类的义例。

《汉志》共分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略之下再分小类，如“诸子略”又分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数术略”又分为六小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不管是“种别”大类还是细分小类，都必须从“别异同”和“核名实”开始，既要弄清各类之间的联系，更要了解各类之间的区别，如“数术略”中“天文”与“历谱”、“蓍龟”与“杂占”之间异中有同，又如“诸子略”中“阴阳家”与“数术略”中“五行”之间相近而有别，在各类之间进行分合取舍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学术难题，“五行”为什么要别出“阴阳家”？“历谱”何以不包括在“天文”内？首先要给每一学科进行命名，命名后才能对各科进行分类，当然命名的本身也就是在作分类，因为给各学科命名和分类都是对各学科“别异同”和“核名实”，对各学科的命名也就是对各学科的分类。准确的命名和分类除了要对每一学科的本质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外，还得对“百家之绪”有宏观的把握，唯有通博鸿儒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对学科或学派命名和分类后，除个别情况外，就不会以人名派，也不会以人类书，不会再像《庄子·天下》将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也不会像《荀子·非十二子》那样让孟子与荀子分属两家，老子与庄子小异而大同，所以他们在《汉志》中都隶属于道家，孟子与荀子虽有不少分歧，他们在《汉志》中都同属儒家。《汉志》很少以人类书，主要是以书类人——以其学术思想的旨归部次书籍和划分流派。《汉志》所收录的 596 家、13269 卷图书大体上各得其所。如果只读《荀子·非十二子》也许会误以为孟、荀如冰炭不可同器，其实正如班固在《汉志·诸子略》所说的那样，他们二人同样都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同样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也就是说他们二人同为儒家宗师，虽然一主于尊德性，一主于道问学，实现“仁义”的路径有所不同，而“留意仁义”的思想倾向则完全一致，《汉志》将《孟子》与《孙卿子》并列，体现了撰者的真知灼见。

作为学术成就的载体，书籍与学术密不可分，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事必有其载，因而《汉志》在总括群书时，自然也就在总括群学。它通过对各科的命名、各书的分类及对各家、各科、各派的排序，建构了古代学术的基本